

中国城镇化与内需增长的互动关系 ——基于 1978—2011 年数据的 VAR 模型分析

黄吓珠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采用 1978—2011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构建 VAR 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明显,城镇化战略不仅有助于扩大内需水平,更有助于内需结构的调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都有助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其中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推动效应更显著。其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放在首位,对投资加以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内需扩大效应和内需调整效应。

关键词:城镇化;扩大内需;投资;消费;VAR 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3)05-0048-09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omestic demand growth: Based on the VAR Model analysis of data from 1978 to 2011

HUANG Xia-zhu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VAR model, we analyz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mand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demand growth promote each othe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elps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domestic demand. Besides, the growth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both contribut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while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s contribu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investment; consumption; VAR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从内需和外贸的关系来看,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38.69% 一路攀升至 2007 年的 62.59%,出口增长在 2007 年经济增长中占 2.6 个百分点。从内需结构来看,投资率居高不下,2011 年投资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攀升至 48.3%,最终消费率一降再降,2011 年降至 50% 以下,不仅低

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在当前世界经济疲软、外需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和内需相对不足、内需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成为政府以及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鉴于城镇化连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及学术界普遍认为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李朴民等^[1]认为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破解内需难题的基本立足点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国内学者围绕推进城镇化和驱动内需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是从经济结

收稿日期:2013-08-18

作者简介:黄吓珠(1989—),女,福建莆田人,硕士研究生。

构方面进行研究。蔡思复^[2]、蔡昉^[3]、吕景春等^[4]从现有的产业结构、产品需求结构出发,认为城镇化能够推动经济结构调节,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优化现有的产品需求结构,从而起到扩充市场需求的作用。二是从消费需求方面进行研究。齐红倩^[5]、田成川^[6]、张士斌^[7]等学者认为我国内需不足、消费不畅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下和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城镇化能够促进农民增收从而创造消费需求;胡日东^[8]、吴铮^[9]等学者通过构建 VAR 模型、VEC 模型对城镇化的消费驱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城镇化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增长。三是从投资需求方面进行研究。李通屏等^[10]通过实证数据比较分析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表明,城市化推动城镇建设从而创造投资需求,城市化首先表现为投资效应,对消费的驱动作用具有时滞性。四是从经济增长方面进行研究。方辉振^[11]、辜胜阻等^[12]从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角度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和战略意义进行了综合分析,从理论角度剖析了新形势下城镇化的价值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3]通过 CGE 模型模拟了我国现行市民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得出每年市民化增加 1 000 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 1 个百分点,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上述文献研究成果为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扩大内需并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理论与政策分析,部分实证分析又多集中探究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单方面促进作用,较少从内需的角度综合考量城镇化、消费及投资这三者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内需由投资和消费构成,城镇化的内需驱动效应真有助于改善我国当前失衡的内需结构吗?城镇化真如理论分析所阐述的那样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吗?扩大内需对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反馈作用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加以探讨。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构建反映城镇化与消费、投资增长之间动态联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城镇化与消费、投资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以期当前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扩内需,促

进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城镇化与内需增长的互动机理

参见以往学者研究结果,并结合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可以得出城镇化与内需增长存在明显的互动效应。

1. 城镇化对内需增长的驱动机理

当前,政府及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城镇化能够从多方面推动内需增长。

一是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扩充市场需求。^[11]首先,城镇化有助于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繁荣与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实现市民化,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提高,非食品支出增加,对服务的需求增加。其次,城镇化推动人口集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扩张。人口的集聚有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撑城乡居民就业,促进其收入增加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

二是城镇化促进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从而创造消费需求。^[7]首先,城镇化能够从多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对农村居民而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促进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带动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城镇就业机会促进其非农收入增加。对城镇居民而言,农民工向城镇大量集聚、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带动城镇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原住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其次,城镇化促进消费水平较高的市民队伍不断扩大,从而扩大总体的消费需求。长期以来,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以 2011 年为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将近 3 : 1,一个城镇居民大概相当于 3 个农民的消费。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拉动整体消费需求的提升。最后,城镇化中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也是农民消费观念、消费心理市民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文化、旅游、休闲、美容、家教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

三是城镇化推动城镇建设从而创造投资需求。^[11]

首先,城镇化本身就是投资过程。城镇规模扩张的过程必然伴随拆迁旧城区,改造城乡结合部,建设新城区、公共设施、市政设施、厂房等一系列投资活动。其次,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必然带来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由此增加对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并通过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带动冶金、建材、机械和批发零售、教育、医疗等一系列行业投资扩张。据测算,每增长1个城市人口可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若城镇人口在2011年的基础上增加2100万,即城镇化率提高1.32个百分点,投资将增加10.5万亿元,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4%。^[14]

2. 内需增长对城镇化的反馈机理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内需增长对城镇化的反馈机理体现在对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上。

一是消费增长有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首先包括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其外在表现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消费总量的扩张和消费观念、消费层次的转型升级(从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医疗、卫生、教育等发展型消费的转变)。因此,消费的增长既是城镇化的结果,也是城镇化的推动力。消费增长特别是消费层次的升级有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助于从生活方式上实现人的城镇化。

二是投资增长有助于推动地的城镇化。城镇化首先是一场“造城运动”,表现为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投资内容广泛,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促进渠道多样。其中,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农业对劳动要素的需求,从而促进更多的农业人口非农就业;旧城改造、新城扩建、产业区建设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有助于推动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为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产业支撑和空间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有助于缓解新转移人口增加带来的城镇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综合分析,从理论上讲,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特别地,按照城镇化驱动内需增长的机理,有相关研究推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有望引致投资增加6.6万亿元,从而可以替代10万亿元出口;^[15]202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6%,城市消费增量所创造的新市场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12]由此可见,从理论上讲,城镇化的内需扩张潜力巨大。但现实中城镇化是否如理论分析所阐述的那样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的驱动效应在时间纬度的分布路径如何,以及投资和消费对城镇化是否具有反向推动作用,这些有待通过构建模型进一步分析解读。

三、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互动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科学地把握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联系,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摒弃传统的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的分析方法,采用完全依赖数据的统计结果建立模型的非结构化分析方法。具体操作中,本文选择自回归模型(VAR),在VAR模型中每个变量都是内生变量,这就避开了传统结构建模方法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反映数据特征,比传统结构模型更能准确地预测经济现象。^[16]

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处理

内需是针对外需而言的,主要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部分构成。为了比较分析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的驱动效应,在探讨城镇化对内需增长的驱动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评析城镇化对内需结构的调整效应,笔者选取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投资水平三个指标构建模型。其中,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反映内需构成中的消费水平,以人均资本形成额反映内需中的投资水平。数据期间为1978-2011年的年度数据,全部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12》整理得到。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分析结论的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资本形成额均以1985年为基期,按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并不会改变数据的特征,却能使数据趋势线性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

列引起的潜在异方差现象,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因此,本文对选取的城镇化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投资水平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LCZH、LPX 和 LPTZ。由于变量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近似于变量的增长率,本文对 LCZH、LPX 和 LPTZ 三个指标取一阶差分,分别反映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的变化率,并以 DLCZH、DLPX 和 DLPTZ 表示。为了考察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拟选用代表变化率的指标 DLCZH、DLPX 和 DLPTZ 构建模型。

2. VAR 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VAR 模型建立的前提要求是模型中每一个变

量都是平稳的或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序列,因此,在建立 VAR 模型之前必须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同时,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在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必须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其他的统计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反映城镇化、消费、投资变动的三个指标 DLCZH、DLPX 和 DLPTZ 进行 ADF 检验。由表 1 的检验结果可知: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均拒绝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非平稳)的原假设,说明 DLCZH、DLPX 和 DLPTZ 是平稳的序列,满足建立 VAR 模型的前提条件。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指标	检验形式(C,T,K)	ADF统计量	临界值	AIC	SC	结论
DLCZH	(C,0,1)	-10.694 750	-3.661 661	-6.110 498	-6.017 983	平稳
DLPX	(C,0,6)	-4.230 786	-3.724 070	-4.060 726	-3.670 686	平稳
DLPTZ	(C,0,1)	-3.714 235	-3.653 730	-5.615 737	-5.524 129	平稳

注:检验形式中 C, T, K 分别代表检验模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变量和滞后阶数;临界值来自 Eviews6.0 软件 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滞后阶数 K 的选择以 AIC 值最小为准则。

(2)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由于 DLCZH、DLPX 和 DLPTZ 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满足建立 VAR 模型的前提,可直接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而无需进行协整检验。在模型的构建中,滞后期的选择往往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滞后期取得越长,越能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滞后期长又会导致模型待估参数变多,降低模型的估计效果。在实际判断中,考虑到样本个数有限,

本文选择最大滞后阶数 4,运用 Log likelihood 对数似然函数值(下文简称 LR)、FPE、Akaike Information 赤池信息准则(下文简称 AIC)、Schwarz Zriterion 施瓦茨准则(下文简称 SC)、HQ 五个评价指标对模型的滞后期进行选择。分析结果如表 2 示,五个指标中有三个选择滞后 4 阶,因而可以初步确定建立 VAR(4)模型。

表 2 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

滞后阶数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236.671 6	NA	2.01e-11	-16.11529	-15.97384*	-16.07099*
1	245.172 0	14.655 76	2.09e-11	-16.08083	-15.51505	-15.90363
2	255.181 8	15.187 33	2.00e-11	-16.15047	-15.16036	-15.84038
3	262.279 1	9.299 841	2.42e-11	-16.01925	-14.6048	-15.57626
4	277.914 1	17.252 42*	1.72e-11*	-16.47683*	-14.63805	-15.90095

(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有效的前提要求是建立的 VAR 模型是平稳的,即要求被估计的 VAR 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数的模小于 1(在单位圆内)。为此笔者对构建的 VAR(4)进行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AR 特征根的倒数的模都落在单位圆内,说明建立的模型是稳定的。进一步地,笔者对构建模型的残

差项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的残差均服从正态分布,并且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现象;且建立的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277.9)较大,AIC 值(-16.48)和 SC 值(-14.64)较小,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由此可以判断,建立的 VAR(4)模型是有效的,可以对模型进行脉冲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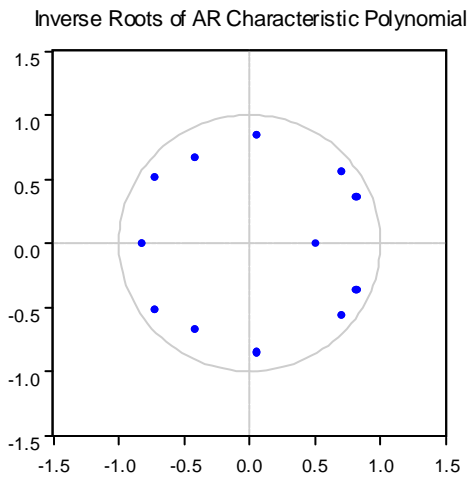


图1 AR特征根的倒数的模的单位圆图示

3. 脉冲函数分析

在VAR模型中,模型系数只反映一个局部的动态关系,因而在现实分析中往往采用脉冲函数分析方法来反映一个变量变化对其他变量的全部影响过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IRF)考察随机扰动项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或变化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并且IRF跟踪这种冲击在将来若干期里所起的影响,表明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如何通过系统影响其他内生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动态过程。^[17]

为突出分析重点,本文主要分析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对城镇化增长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冲击的响应函数(图2、图3)以及城镇化增长率分别对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图4)。

(1) 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投资增长对城镇化增长率的当期的一个正向冲击在考察期内的响应呈波动收敛现象,且以正向响应为主。具体的响应轨迹表现为:对当期城镇化增长率的一个正向冲击,投资增长率表现出一个较大的正向响应,该正向响应在第2年达到最大值;此后正向响应逐渐减弱,在第3年开始表现为负向响应,且负向响应一直持续到第7年。这表明在此期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第7年后,城镇化又恢复对投资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期间虽伴随着负向波动,但正向效应与前几年相比持续时间更长也

更稳定。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累积响应情况可以发现,当期城镇化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前5年、前10年和前20年分别累计提高0.010896、0.011201和0.010474个百分点。由以上分析可知,城镇化在整个考察期内对投资增长有正向影响。在短期内(第1、2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必然伴随着旧城拆迁、新城建设、城镇规模的扩大,由此带来短期内投资的大幅增加;中期内(第3—7年),受社会资源及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的限制,加之短期急剧扩张的投资规模还未来得及消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对投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投资增速减慢;从长期来看(第8年后),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在城镇安定下来并实现市民化,必定需要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应扩张作为支撑,这将带动投资的高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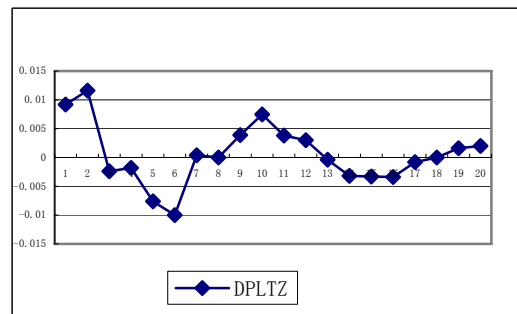


图2 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函数

(2) 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路径基本上与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响应模式一致,均表现为短期正向响应,中期负向响应,长期正向收敛响应。但在响应的的时间轨迹以及响应程度上,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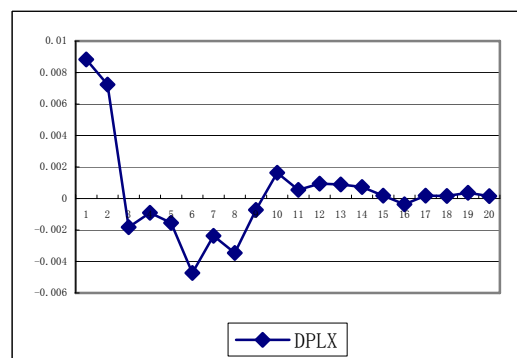


图3 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函数

具体表现在,面对来自城镇化增长率当期的一个正向冲击,居民消费增长率也立即表现出较大的一个正向响应;与投资增长对城镇化冲击的反应不同的是,这一正向冲击在第 2 年就开始减弱,并在第 3 年至第 9 年表现为负向响应。此后正负响应交替,并以正响应为主,但响应力度和波动程度均比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响应小。这主要是由于当期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业人口向城镇加速转移,使得居民城镇消费支出短期内急速扩张,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相应提高。从中期来看,一方面由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由于能够大幅吸纳转移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城镇就业压力增大,收入不确定性增强,居民消费趋于保守,消费增长率放缓,从而表现出消费在中期内对当期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负向响应。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必然带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由此必然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

进一步分析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累积响应情况可以发现,当期城镇化推进速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在前 5 年累计提高 0.0011701 个百分点,在前 10 年累计提高 0.002363 个百分点,在前 20 年累计提高 0.005907 个百分点。与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累积响应情况比较,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居民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累积响应值都比较小,这说明在采取加速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方面,加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对投资的驱动效应更强,超速的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助长投资增长率超过消费增长率,进一步恶化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内需结构。

(3) 城镇化对投资与消费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图 4 可以看出,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增长率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于当期投资增长的一个正向冲击,消费增长的冲击对城镇化产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也更稳定。给消费增长率施加一个正冲击,城镇化增长率从第 2 年开始产生一个最大的正响应,此后对该冲击的正响应虽有所减弱但一直持续到第 9 年才转为负响应,负响应程度较小,在第 16 年再

次转为正响应,并趋于收敛。相应地,对投资增长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城镇化增长率也没有立即作出响应,第 2 年开始作出较小的正响应后在第 3 年就转为最大的负响应,此后正负响应交替出现,直至第 16 年后开始表现为稳定收敛的正响应。城镇化对投资增长率变动的响应呈正负明显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的推进既需要投资“量”的支撑,又需要投资“质”的保证。当期投资规模的大幅扩张可能引起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就业吸收能力的增强,这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而从长远角度出发,投资规模扩张吸收就业的能力取决于投资质量和投资结构,“重量不重质”的盲目重复投资只会造成资源的扭曲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困境,终将阻碍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对投资增长率变动的正负波动响应进一步揭示了我国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投资结构的改进和投资效益的提高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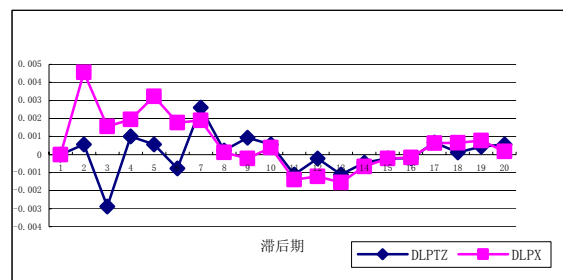


图 4 城镇化对投资及消费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

综上所述可得,尽管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变动存在一年滞后反应,但从长期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加速增长均会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地,消费增长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效应更加明显,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旅游、家政、美容养生等享受型服务行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吸收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进而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

4. 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仅仅描述每个内生变量对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冲击的响应情况;方差分解则在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考察 VAR 模型中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16]。为了对城镇化与投资、消费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影响

的相对重要性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下面利用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对所构建的 VAR(4)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考虑到方差分解结果在第 10 年后基本趋于

稳定,本文只给出前 10 年的方差分解结果。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城镇化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均列入表 3。

表 3 各变量方差分解的结果

滞后期	DLPTZ 的方差分解			DLPX 的方差分解			DLCZH 的方差分解		
	DLCZH	DLPTZ	DLPX	DLCZH	DLPTZ	DLPX	DLCZH	DLPTZ	DLPX
1	10.49	89.51	0.00	35.36	19.30	45.34	100.00	0.00	0.00
2	20.48	70.68	8.83	43.34	15.45	41.20	81.78	0.20	18.02
3	20.65	69.97	9.38	43.25	16.21	40.54	78.36	6.20	15.44
4	20.71	69.73	9.56	42.05	18.38	39.57	77.64	6.19	16.17
5	21.16	67.11	11.72	40.73	19.36	39.91	74.21	6.08	19.72
6	25.28	64.24	10.48	43.37	19.96	36.67	73.00	6.12	20.88
7	24.27	64.48	11.25	42.77	19.79	37.43	69.21	9.35	21.45
8	24.24	64.52	11.25	43.73	18.91	37.36	69.28	9.35	21.36
9	24.42	64.44	11.14	43.76	18.92	37.32	69.92	9.49	20.59
10	26.43	62.50	11.08	44.08	18.89	37.03	70.61	9.34	20.05

分析表 3 可知,方差分解的结果与前文脉冲函数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城镇化能一定程度地驱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也能反向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同时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投资增长和城镇化受自身变动的的影响显著。由表 3 投资增长率和城镇化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增长和城镇化均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特征,受自身变动的的影响显著。在第一年中,投资增长的变动和城镇化增长率的变动分别有 89.51%和 100%可以由自身变动解释,此后自身影响虽有所减弱,但基本稳定在 60%以上。

二是相比于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受城镇化的影响更大。对比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城镇化增长率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要比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大得多,这看似与上文脉冲分析的结果相悖。其实不然,这主要是由于脉冲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脉冲分析考察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其他内生变量一个正向冲击的响应程度,是就单个变量的冲击而言;而方差分解则比较分析了不同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投资增长率的方差分解中,尽管来自城镇化增长率的变动对投资增长率变动的贡献率在第 2 年就达到 20%左右,并在第 10 年上升到 26.43%。然而,由于相比于消费,投资具有更强的“自我实现”性,投资增长率的变

动受自身变动的的影响更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镇化对投资增长率变动的相对重要性减弱。因此,尽管投资增长率变动比消费增长率变动对城镇化推进速度的变动反应更敏感,但支撑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而是受其他各种短期利益因素决定的投资结构本身不合理。特别地,从消费增长率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消费增长的单位变动中,城镇化的影响更大。当期消费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有 35.36%来自当期城镇化的贡献,在第二期城镇化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就超过消费增长率自身变动的贡献率。由此可见,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应明显,尤其是在驱动居民消费增长的诸多动力中,城镇化动力的贡献作用尤为显著。

三是消费增长推动城镇化的贡献远大于投资增长的贡献。从表 3 对城镇化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增长率的变动对投资和消费增长变动的反应均存在一年的滞后期,且城镇化受自身变动影响显著,具有很强的自我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消费和投资增长率的变动都将带动城镇化增长率的变动,在第 10 年消费和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20%和 10%。这说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均有助于推动城镇化,但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的推动效应显著强于投资增长对城镇发展的拉动效应。这一结果与经济逻辑一致,城镇化进程

更多地表现为人的主体选择过程，是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提升后自发选择的结果，投资只是推动城镇化的辅助手段。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以我国 1978—2011 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在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比较分析了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增长的驱动效应，以及投资和消费增长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效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明显。对城镇化增长率的一个正向冲击，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在短期内均表现出较大的正向响应，此后虽正负响应交替出现，但长期内仍以正向响应为主。相应地，受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城镇化增长率的响应在长期内也主要以正向响应为主。这说明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效应，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带来投资和消费增长率的提高，促进内需的大幅增长；而投资和消费增长率的提高，内需的大幅增长，在长期内也会对城镇化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这一结论与 2010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3]通过 CGE 模型模拟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城镇化确实有助于内需的扩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

(2) 城镇化的投资驱动效应显著强于消费驱动效应。受城镇化增长率一个正向冲击的影响，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累积响应均表现为正向响应，但投资增长率的累积响应情况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比消费增长率的累积响应大，投资对城镇化增长率的单位变动反应更敏感。这一结论与李通屏等学者 2005 年对城镇化投资驱动效应和消费驱动效应的实证比较研究结果一致，即相对于消费效应而言，城镇化首先是一种投资效应，这种效应倾向于抬高投资率而压低消费率^[10]。这说明在采取加速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方面，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对投资的驱动效应更强；超速的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助长投资

增长率超过消费增长率，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的进一步失衡。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质量、求平稳、顾大局，有甄别性地布局规划而非盲目追求速度与规模，防止城镇化在发挥扩大内需巨大效应的同时加剧内需结构的失衡。

(3) 消费增长比投资增长更大程度上受惠于城镇化发展。尽管城镇化增长率的相同变动对投资的驱动效应更大，但对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消费增长率的变动更大程度上受城镇化增长率变动的的影响。在消费增长率的单位变动中，城镇化增长率变动的贡献作用更大。这主要是由于，投资需求受经济周期、政策因素等短期变动因素的影响强烈，投资增长更多表现为短期变动因素而非城镇化这样长期稳定因素的作用结果；消费需求主要受收入和预期等较为稳定因素的影响，城镇化极大地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预期的改变，从而对促进消费增长的贡献显著。因此，为实现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推进城镇化进程是科学有效的，但为避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投资的盲目扩张和内需结构失衡的进一步恶化，应对城镇化的推进加以引导，立足于人，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作为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 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消费推动而非投资拉动。脉冲函数分析表明，城镇化增长率对消费增长率的一个正向冲击的响应要比对投资增长率变动的响应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也更稳定。进一步地，对城镇化增长率的方差分解也表明，消费增长比投资增长对城镇化增长率变动的贡献更大。这说明相比投资增长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消费增长对城镇化的推动效应更大。在城镇化初期，消费需求较低，不足以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大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等投资既有助于夯实城镇化基础，也有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在长期，投资规模的急速扩张非但不能带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反而可能导致大批的重复建设、人地矛盾、资源配置扭曲和生产过剩等问题，有损城镇化的质量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在长期，必须注重消费需求的培育与挖掘，把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城镇化的主动力。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通过城镇化扩内需的发展

战略是积极有效的。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方面,城镇化更是发挥着显著作用。尽管城镇化对投资增长的驱动效应更明显,但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城镇化的贡献更大;支撑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绝非城镇化,而是受其他短期利益驱使的不合理投资结构本身。因此,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只要对投资加以合理引导,使城镇化的投资驱动效应更多表现在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投资的增加,那么,城镇化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相应地,投资和消费增长都能推动城镇化,但消费增长是主导因素。城镇化不仅仅是农地减少和城镇规模扩张的过程,更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享受城镇文明生活的过程。只有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其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意愿均满足时,城镇化进程才能够顺利推进。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把推进人口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摆在土地城镇化前面,防止城镇化变成“有城无市”的造城运动。

注释:

- ① 内需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的,用支出法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其基本动力可分内需和外需。外需即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通常把对国外的出口看作外需。内需是指一个经济体内部全部需求的总和,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 ②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一般用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 ③ 消费需求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政府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其中居民消费需求是主体,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 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以2010年为基准年,通过CGE模型模拟实现市民化人口每年增加5%时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实现市民化的人口每年增加1000万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促进居民消费增加1524.4亿元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84.5亿元,并使净出口减少83.0亿元,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
- ⑤ 李通屏和成金华通过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投资效应与消费效应比较研究发现,1980-2004年,城市化的投资弹性和消费弹性分别为1.97和1.49,即每增加1万城市人口所引起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97亿元,而引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只有1.49亿元。由此得出城

市人口增加的投资效应大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扩大的消费效应。

参考文献:

- [1] 李朴民,田成川,杨特.加快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战略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09(11):24-27.
- [2] 蔡思复.城市化是克服市场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99(5):24-26.
- [3] 蔡昉.加快城市化进程启动城乡消费[J].会计之友,1999(12):12-13.
- [4] 吕景春,胡钧浪.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兼谈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基本路径[J].中国流通经济,2011,25(8):73-78.
- [5] 齐红倩,刘力.城市化: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J].管理世界,2000(2):10-14.
- [6] 田成川.城市化: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管理,2004(8):36-38.
- [7] 张士斌.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联机理及启示[J].开放导报,2010(8):95-99.
- [8] 胡日东,苏慧芳.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关系的动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7(5):58-65.
- [9] 吴铮,李广泳.滞后的城镇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16-22.
- [10] 李通屏,成金华.城市化驱动投资与消费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5,22(5):65-69.
- [11] 方辉振.城镇化创造国内需求的机理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3):49-53.
- [12] 辜胜阻,李华,易善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J].中国人口科学,2010(3):2-10.
- [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陈昌盛,等.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4-15.
- [14] 梁达.试论我国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J].金融与经济,2012(3):23-25.
- [15] 辜胜阻,武兢.城镇化的战略意义与实施路径[J].求是,2011(5):27-29.
- [16]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88.
- [17] 郭江山.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动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4):69-74.

责任编辑:李东辉